

辛亥革命史丛刊

XINHAIGEMING SHICONGKAN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第12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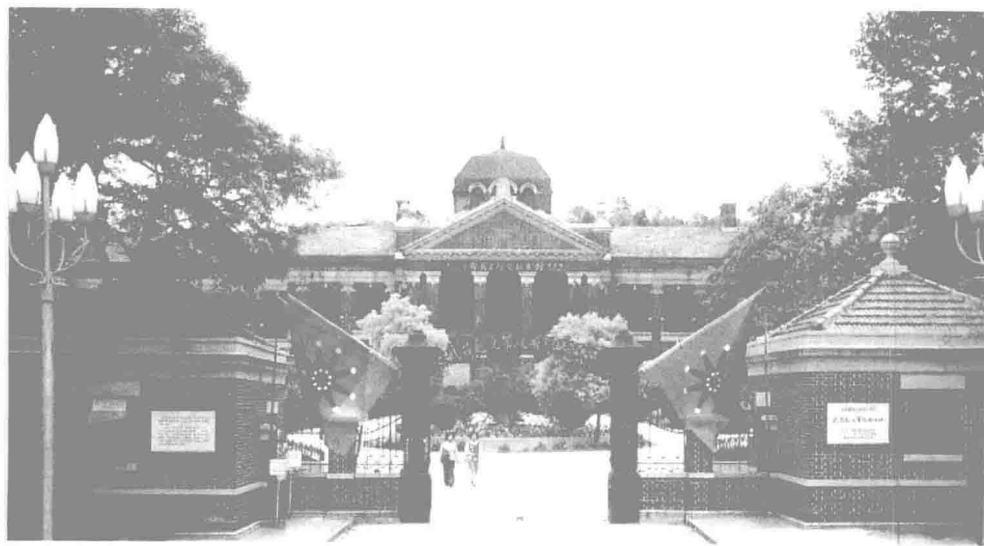
© 湖北人民出版社

K257-55
1/12

XINHAIGEMING SHICONGKAN 辛亥革命史丛刊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编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第12辑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 12 辑/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9

ISBN 7-216-04441-X

I. 辛…

II. 辛…

III. 辛亥革命—研究—丛刊

IV. K257.07-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2441 号

辛亥革命史丛刊 第 12 辑

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编
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市明伦印刷厂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数:326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13.125
插页:4

版次: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数:1-1 000

印次: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书号:ISBN 7-216-04441-X/K·451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辛亥革命史丛刊(第 12 辑)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章开沅

副主编 吴剑杰 严昌洪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建中 王兴科 王定海 朱 英

吴剑杰 严昌洪 陈昆满 陈 钧

周 波 章开沅 商光敏 温 健

目 录

[1] 试论张謇现象

——状元下海的文化解读 章开沅

[25] 孙中山与新加坡两报论战 彭 剑

[54] 爱国画家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吴健奎

[80] 试论辛亥革命后内藤湖南的中国观

——《支那论》的成书过程与熊希龄内阁的关系 陶德民

[107] 回顾二十世纪严复研究的发展 苏中立

[125] 论戊戌变法失败原因

——兼论戊戌政变原因 李英铨

[151] 朱峙三日记(连载之三)

试论张謇现象

——状元下海的文化解读

章开沅

张謇生长在落后的农村，从小接受的是旧式科举的应试教育，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八股文章做得中规中矩，言必称孔孟，行必循礼教。虽然经过十多年科场蹉跌，终究在不惑之年大魁天下。在传统读书人的心目中这便是平步青云，实乃走向飞黄腾达的起点。但他就在高中一甲一名的那年决意返回乡里，以状元身分经商并创建大生纱厂，从此走上发展现代实业、教育的不归路。状元及第不足奇，状元下海古来稀。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张謇现象”。

“张謇现象”的产生有其历史的必然。因为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和东南地区自然经济的日趋瓦解，已经在市场和劳动力等方面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加以 19 世纪中叶以来维新思想先驱们一贯提倡的“商战”思想的启蒙，和 30 年洋务派兴办多种企业的先导，在甲午战败民族危机刺激下必然会出现兴办民族工商业的小小热潮，也必然会出现一批为数不多的早期现代化的开拓者。但是，偏偏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南通，偏偏是在比较保守的科举士子群体之中，出现这样一个声名显赫、光彩夺目的先进创业英雄，真像现今人们常说的爆了一个大冷门。这就需要从张謇本身素质作深入的寻绎。

1. 家庭教育与社会环境

张謇的家庭虽然是租田务农，但从祖父朝彦开始也兼营瓷器贩运，父亲彭年仍然走的是这条谋生之道。张謇出生之日，正是太平军定都金陵三个月之后。由于太平军近逼江南和上海小刀会起义，大批江浙、皖南的地主、商人把比较偏僻的通海地区视为避难桃源。他们的陆续到来，增进了通海地区与外界的经济联系，也多少带来一些新的经济信息。据说，正是在这些年月，彭年曾借钱经由上海到宁波做点小生意，并且多少增加了一点家庭收入。因此与一般旧式农民相比，彭年显得比较精明，稍有市场意识，略知经营之道，对张謇的教育也不同于普通农家。

彭年对张謇的期望当然是通过科举博取功名，借以改换门庭光宗耀祖。但是他又与一般比较富有的士家大族不同，他不仅命张謇兄弟为塾师洒扫侍应，而且还要他们随雇工在棉田锄草，并在家中建房时帮忙作杂工。张謇晚年曾回忆说：“后有兴作，凡木石砖瓦，一一度其修短厚薄之尺寸而预计之，无有差忒。临时必使謇兄弟杂作小工，而于砌墙每层将合时，尤令注意于需砖之度，相其修短厚薄，检以畀工。曰：‘工屡觅砖，或断砖不合，则耗时而费料，亦以练儿童之视力。’至他人家，亦视其营造之合否而教之。以是謇于土木建筑计划，稍稍有知识。”^①

幼年时的家庭教育对张謇影响颇深，在他成年后的日记中常可发现有关建筑材料的数字记载。如光绪十四年（1888）四月三十日记：“青口圩周九百丈，高一丈八尺。外基砖六层，最上二层无砖有谯楼。砖每个重六斤八两，每个钱六分半，……合工料二万五千金上下，木石料不在内。”同年十一月二十日还摘录《申报》刊载的一篇有关河防文章：“疏沙机器船，小号方三、四丈者，马力四十匹，每日六时能出沙、泥三百万斤，抵人力三千工。”从中不难看出，张

^① 《述训》，《张季子九录·文录》。

张謇已经习惯于比较准确的计算。他是在计算圩的周长、高度和砖的重量、单价的基础上，估算仅砌砖一项的工料价银。而在了解疏沙机器船时，又注意到每艘（小号）每日开动 6 小时即可抵人力 3000 工（以每人每日挖泥沙 1000 斤计算）。过去人们常常讥讽旧式的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其实还宽恕了他们另一个大缺点，即大多习惯于模糊思维而缺乏数量概念。可能与传统儒学以伦理为核心的理念有关，他们提倡道义而耻于言功利，“锱铢必较”或“斤斤计较”被看成是市井小人的鄙俗，所以商人只能列为四民之末，而商业也就成为百业之末。当代有的历史学家曾经把现代化国家形象化地称之为用数目字管理的国家，这不仅由于现代化的财政需要计算精详的会计与统计，而且作为现代化支柱与驱动力的科技更需要以准确的数据为基础。张謇不仅参加过农田劳作与建筑杂活，颇“能知稼穡之艰难”，而且脑筋里经常具有数量观念，稍能计算成本或效率，这是张彭年先生对儿子教育的大成功，也是张謇被历史选择为现代工业家伟大先驱者的内在依据之一。

通海地区盛产棉花，家庭手工纺织业也比较发达。从地理环境而言，这一带东北滨海，南面临江，大多为江海冲积平原。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温度为 15℃ 左右，7 月最热平均气温为 28℃ 左右。年平均降水量为 1046.3 毫米，集中在夏秋两季。因此，此地的土壤、温度、雨量、霜期都宜于植棉，不仅产量较高，而且洁白并富弹性，很早即以“沙花”著称，盛销于东南沿海地区。通海地区农家大多以手工纺纱、织布为副业，最初主要是织一种专门供包装货物、裱糊油篓、制作船帆之用的“稀布”、“小布”；中法战争前后，根据市场需要，逐步改织可供制作衣被之用的“通州大布”。这种大布（指长度、宽度俱有所增加）平挺厚重，保暖耐磨，深受一般劳动民众欢迎，尤其畅销于历时已久的东北传统市场。随着花、布销售量的迅速增加，专营收购运销业务的布庄也纷纷兴起，并且形成一定的市场分工。有所谓县庄，专销里下河各县；京庄，专营南

京远销；关庄，则从事远销山海关以外^①。张謇的家庭和他本人与当地花布商很早就有所交往，这也可以说是影响他此后成为大生纱厂创办人的最贴近的环境。

2. 传统文化的内在变迁

毫无疑问，张謇早年所接受的教育完全是正统儒学。根据他自己的记述，起初是人邻塾从邱畏之先生学习，到10岁已读完《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千家诗》、《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等书，但无非是死记硬背而已。到11岁那年，张彭年另请一位屡试不中的老秀才宋蓬山先生来家授读。宋先生检查张謇兄弟学业，发现“音训句读多误”，那主要是由于邱先生的平庸与敷衍，遂命他们从《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开始，尽换新课本重读。张謇的学业有所进步，又读了《诗经》、《尚书》、《易经》、《孝经》、《尔雅》、《礼记》等书，并学习做五七言诗、试帖诗，到13岁那年粗能“制艺成篇”，即初步经历科举考试的基本训练。张謇自幼聪慧，学习勤奋，居然在15岁那年经院试取中第26名附学生员，但仍谈不上什么真正的学问。

从同治十年(1871)开始，张謇认真求教于海门训导赵菊泉先生。“先生令尽弃向所读之文，以桐城方氏所选四书文及所选明正、嘉、隆、成、天、崇文授读，每课艺成呈阅，则乙抹过半；或重作，乙抹如前。训导严甚，乃大愤苦。逾半年，抹渐少，复命从事朱子《四书大全》，自是益进，读宋儒书。”^②但这也无非是科举教育的严格训练，使之从应试内容到形式更加符合时尚的正统规范，仍然谈不上什么真正的治学。

张謇真正掌握治学门径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到南京之后。

^① 参见林举百：《近代南通土布史》，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第150～172页。

^② 《啬翁自订年谱》，《张季子九录·专录》卷六，第6页。

当时张謇在江宁发审局担任书记,由于公务并非繁忙,所以常有余暇向钟山书院山长李小湖、惜阴书院山长薛慰农、凤池书院山长张裕钊等知名学者,请教“治经读史为诗文之法”。其中以张裕钊对他影响最大,20年后他为这位恩师所写祭文说:“呜乎!道义橐籥,寓于文章。三代悠邈,下迄汉唐。越宋、元、明而昭代,组微著于归、方。刘、姚禅作,姬传尤昌。再传之盛,举起湘乡。孕忠耿于天骨,荡元气而翕张。惟夫子之轶绝,乃尽窥其室堂。”这不仅是对张裕钊的推崇,而且也表明了自己在学术上的取向。此后,张謇的治学逐渐摆脱了制艺文章的狭隘格局,接受了当代桐城派合义理、词章、考据为一炉的宗旨。从他在光绪最初二十年间的日记来看,平素所读书已不限于经部,而是有意识地扩大到子、史、集三部,甚至也读稍犯忌讳的《船山遗书》乃至某些禁书(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幸存录》等)。这些阅读对他的思想变化都有某些影响。

张謇并非专以著述为事业的学者,但在光绪十四年(1888)应聘主持赣榆选青书院并兼修县志,同年亦曾应太仓知州邀请,商谈修志体例,光绪十七年(1891)参与修东台县志,光绪十九年(1893)又应崇明知县邀请主持瀛州书院。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侧重于学术著作的时期。在此期间他“曾求宋、明、清名志读之,殆十之六七”,并先后写成《释志谱》(1884)、《说文或从体例错出》(1886)、《蜀先主论》(1887)、《赣榆县志序》、《赣榆释》(1888)、《不穀不仅诸侯说》、《督抚提镇即古诸侯说》(1889)、《周易音训句读》(1891)等文。当然,由于张謇为家庭生计所累,且又志趣偏重实际事务,所以除县志和《周易音训句读》外,其他文章都很难说是系统学术研究。不过,通过这些学术活动的若干特点,仍然可以看出张謇的思想正在发生若干微妙变化。

首先是重视地方志的编修,并且谋求有所革新。除参与纂辑赣榆、东台两部县志以外,还曾辑志例且欲编著《志通》,颇想在方

志学方面构架新的体例。他讥刺某些旧志内容陈腐，“独斤斤于匹夫匹妇未彰之行，务广搜博采以发幽凡，可谓知二五而不知一十”，即过分侧重节义彰显而忽略了方志其他更为重要的社会功能。他强调应将侧重点转移到有益于当代的重大问题，如“疆域之沿革”、“民生之利病”、“人物之去取”等。在体例方面则主张把食货、学校放在军政、官师、人物各部之前，已经表现出对于实业、教育两大问题的特别重视。在修志方法方面，他认为除需要查考旧有文献外，还必须加强实地调查访问，而且还要反复核实以避免轻信道听途说。“用所疑惘，质于其父老大夫，搢绅先生，事无纤巨，咨叩数反。”^①此外，他还强调志书叙事必须真实，制作图表也应力求精确，避免以讹传讹遗患无穷。这些都初步表现了张謇一贯的严谨务实作风和以后的事业趋向。

其次是在学术上反对党同伐异，在包容性中略有多元化的潜质。在历经科场折磨之余，他对科举取士限于一家之言颇为反感：“四子书用朱子集注，县为功令。士务制艺，中学使者春秋试官之程格，影附朱子而已。”他指责当权的守旧势力蓄意扬朱而抑陆：“据朱子一时各有所当之言，乘慈湖杨氏涉近禅理之隙，集矢象山，哄为大诟。”他不仅为陆九渊辩诬，而且主张应让士人各就其性之所近，自行选择“从学之途，不限一辙”^②。当然，他所主张的消除门户之见只限于传统儒学的范围之内，但他不甘于盲从时尚学术主流，特别是逐渐看透科举的桎梏个人性格。他在晚年曾经剖析科举的弊端说：“顾策问沿汉以来，诗赋沿唐宋以来，制艺沿明以来，试士之法至清大备。而其不能得士也，弊即缘于备。惟其求备，故士之应其求者，往往自剪髻至于皓馘，习闻之而躬承之，矻矻孳孳，口诵而手披，朝研而夕摩，以奔走于有司之试。试不得不悔，

① 以上根据《赣榆县志序》，《张季子九录·文录》。

② 《迺建象山书院记》，《张季子九录·文录》。

且思所以应备之求，而诡其遇于试者则百其途。而固有遇者，于是所为备者伪，而求亦伪。迨夫世变剧烈，习用大乖，士应无术，而屏而辄之之运至矣。虽然，此未可以咎士。”张謇认为是陈旧的取士制度残害了士，并且以自己往昔的科举生涯现身说法：“（前略）二十四试补廪膳生，乡试连捷；二十七试得优贡，而乡试乃五捷；三十以内忧未预试。是八年中试屡捷，应试之求屡进而亦渐悟，是应制诗文，亦当自道其心之所明，自见面目，不戾于凡为文之义理。”^①张謇还痛定思痛，把 20 多年的应试历程归结为一句话：“私以为试于有司，供其喜怒而寒燠之。”可谓浪费光阴与生命之甚！

对以科举应试为依归的旧式教育的批判并非始于张謇，如龚自珍早就斥之为“疲精神耗目力于无用之学”^②。其后，来华外国传教士更不乏对中国传统教育批评的声音，如林乐知就认为中国学校“专尚举业”、“皆教以修六德行六艺，务乎修齐平治之学”，使国家缺乏各方面有实用的人才^③。而“三年一乡试，于各行省而中式之举人数百人或不能得一二人焉；余以选拔优行贡入成均者，尤落落如向曙之星”。至于绝大多数名落孙山的士人，“既不能奋进于功名之路，退更不能免于贫窶之嗟”。其他中国有识之士对科举教育与取士教育的批判亦多。但是，只有像张謇这样身受 30 年科场折磨的人，才能更为洞悉科举的弊病及其危害，而他们的反戈一击也更能发人深省。张謇在甲午大魁天下之前十多年间，内心潜藏着日益深刻的矛盾。作为在科举这条老路上长途跋涉的行人，他的精力与时间投入太多，传统思想（特别是所谓“正途出身”）的影响太深，他很难半途而废，断然诀别考场。作为恪尽孝道的儿子，他更难于置老父的殷切期望于不顾，一意孤行中止举业改而从

① 《张季子九录·外录》自序。

② 《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16 页。

③ 林乐知：《中国专尚科举论》，《万国公报》第 15 册，第 9621 页。

事其他行当。赶考是他最不愿意做而又不得不去做的事情，我们在《柳西草堂日记》中可以看出，许多次考试他都有极不愉快的遭遇，或燥热奇冷，或大雨泥泞，拥挤不堪，或感受风寒，发热头痛。不断的应试和不断的失败已经使他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这种心理不仅在给友人的信函上多次流露，甚至在若干试卷上也有曲折的反映。譬如光绪十一年(1885)乡试试题有“孔子尝为委吏矣，一节”，他的制艺文章总共只有720字，但其中颇多借题发挥的微言大义。照录如下：

奉职惟称，圣人且然矣。夫委吏乘田，其职虽卑，而不得谓非职也。会计牛羊，孔子何尝不求其称哉！且国家所以少任事之人者，以喜事之人多也。喜事则好为难事，而忽所易事。夫事者，何者可视为易？易乎事者，岂真才有余于其事？惟未周乎事之分际，而自以为才，则心日轶于事之外而冀功，才并不足于事之中而课效。而国家任事之人乃少，而国家废坠之人乃多。曷观孔子处卑且贫之时乎，孔子抱经纶万物之才，使得畀以建邦定国之权，则酌盈剂虚，必有以均于万物。孔子裕覆育群生之量，使上处夫风舞麟游之世，则调元赞化，必有以蕃阜乎群生。然方其贫也，则尝为委吏矣。委吏者，礼所谓掌领野赋，以稍聚待宾客，以旬聚待羁旅，以余聚待烦赐者也，贫则为之。又尝为乘田矣，乘田者，礼所谓掌牧六牲，祭祀共其享求，宾客共其牢礼，乡射共其膳膳也，贫则为之。为之则有委吏之事，为之则有乘田之事。自计吏综核之风盛，而大体不明。其甚者至身秉国钧，但日亲乎酒酤盐铁之微，较量锱铢而自为得计。而缙绅委蛇之士，又或举国家所赖以度支财用者，听之胥吏而漫不经心。始第遗其事之数也，终且并其事之意而忘之，往往然也。自长吏司牧之义堕，而物生益蹙，其甚者虽托以民命，亦且视为草芥犬马之贱，恣肆残贼而靡有

终究。而园林猥琐之官，益得举国家所资以修明典礼者，任其瘀蠹而有所藉口。始第病其物之生也，终且并其物之数而减之，往往然也。若夫孔子为委吏，则曰会计当焉。会者由散而至聚，计者于合而见分；而聚散分合之间，必使之料量平而差分析，当何如也。治人之事者，固不必即事居功；但使所治之事，俾其人不至有付托之悔，而吾责已可谢矣。度孔子亦曰，会计当而已矣。为乘田则曰，牛羊茁壮长焉。茁者孳生相续，壮者蕃盛为群；而孳生蕃盛之际，尤使之饮食节而起居时。长何如也？受人之物者，莫患于物损其旧；诚使所受之物，如有人所本欲爱惜之心，而吾心已无愧矣。度孔子亦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由是观之，任事者必不容于事外喜事，而不当任事者不当处重任之地，不益晓然哉！

这是光绪十一年八月十日张謇于顺天乡试首场交卷的文字，起承转合，悉中规中矩，是一篇堪称上乘的八股文章，但其寓意或多或少越过时文规范的界限，讲穿了就是对现实政治有所触及，而这就难免要冒一点风险。正如其他各种行业一样，举业也有自己的游戏规则。张謇自幼至长，历经十多年岁、院、科、乡各级考试的反复磨炼，已经学会了应付科举考试的全副本领，撰写八股文章自然是得心应手，所以能够利用其基本构架和逻辑规范，巧妙地“自道其心之所明，自见面目”。这是一种颇有趣味而又相当艰难的游戏，仿佛是足球比赛的合理冲撞，或者是乒乓比赛的擦边球，只有竞技高手才能运用自如。此文的宗旨显然是强调人生目的应为做事而不是做官，即使是做官，无论级别高低，都应努力把自己主管的事情做好，切忌处高位而徒务虚名。这与他以后所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显然是一脉相承。张謇把“职”与“事”联系在一起，也就是把岗位与工作联系起来；任这个职就得干这个事，这就是所谓

“职务”。职者，官职也；务者，任务也。古今猎官族之通病就是眼睛只盯住职，却把务视为可有可无。所以张謇开宗明义就标榜“奉职惟称”的原则。委吏固然位卑，但“不得谓非职也”。既然是职，任职者必求“称”职，就是履行自己的责任，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以孔子之大才，既任委吏，虽会计牛羊也得管好，务求称职。司会计“必使之料量平而差分析”，为乘田，则确保“牛羊茁壮长焉”。孔子抱经纶万物之才，怀覆育群生之量，可以建邦定国，可以教化万民；但他虽处卑位而仍兢兢业业以求称职，这才是做人任事的楷模。张謇利用钟馗打鬼，抬出孔子就是为了抨击时政。所以他笔头一转，直截了当地指摘：“且国家之所以少任事之人者，以喜事之人多也。”所谓“喜事”就是好大喜功专务虚名，但张謇措词颇为巧妙，说这些官员是“好为难事而忽所易事”。张謇批评说，既然做事就不会容易，那些把事情看得容易的人并非才过于事，无非自以为才高八斗而其实对事的本身并不了解，更缺乏应有的办事才干。因此，他们的心思未能用于任事，却整天盘算如何邀功，其结果便是国家任事之人少而废坠之事多。许多当政者漫不经心，把国家的度支财用听之胥吏，“始第遗其事之数也，终且并其事之意而忘之”，“其甚者虽托以民命，亦且视为草芥犬马之贱，恣肆残贼而靡有终穷”。文章的结语是：“任事者必不容于事外喜事，而不当任事者不当处重任之地。”真是字字掷地有声，饱含着张謇对世情的洞察，内心郁积的忧愤。

只有通过对张謇漫长而又艰难的科举生涯的深入考察，并且贴近体会他历经多次事变之后的人生领悟，我们才有可能领会到甲午（1894）年发生在他身上的巨大变化。

甲午这一年，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举行“恩科会试”，对于屡试不中的各地举子们来说，这是又一次很好的机会。可是张謇早已心灰意懒，“试事愿四十为断”，并未寄予希望。但张彭年已经有76岁，急于亲眼看见儿子金榜题名，恳求说：“儿试诚苦，但儿年

未老，我老而不耄，可更试一回。”^①哥哥张簪也远从江西来信督促。张謇不敢也不忍违背父兄之命，只有勉强前往北京应试。进考场时，连试具都是“杂借自友人”，发榜前又不去“听录”，可见心情之荒忽。张謇当时刚过不惑之年，正是人生做大事业的黄金时期，但姗姗来迟的状元及第并未给他带来极大的惊喜。他在以一甲一名新进士身分在乾清宫引见的那天，日记上却只有寥寥几笔记述：“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彭年于这年九月病逝，他有感于“一第之名，何补百年之恨；慰亲之望，何如侍亲之终”，^②遂匆匆返归故里。张謇中了状元，认为已经实现了父亲的期望，也为自己 30 多年的举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他并不认为科举制度应该照老样延续下去，更不愿循着学以致仕这条老路继续走下去。他诀别仕途便是诀别科举，也就是对传统士大夫人生格局的挑战，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中，状元下海需要多大的勇气！我认为这勇气，这决心，其驱动力主要来自张謇在沿袭传统文化的同时所伴生的强烈逆反心理，当然这种逆反心理又与科举制度与时代潮流之间的极不协调有关。

3. 顺应潮流与中体西用

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且又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主义，所以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对知识分子的防范方面尤为严密，集中体现为多次文字狱的残酷杀戮。在这种暴虐统治下，士大夫很难发挥自由思想，即张謇所说的“自见面目”，除墨守程朱专务举业以外，有志于学术者大多只能以训诂考据为安身立命之所。有清一代考据学的发达在乾嘉时期盛极一时，堪称中国两千多年学术史上的奇峰突起，但其中却包含着许多卓绝不群的知识分子

① 《啬翁自订年谱》卷上。

② 《啬翁自订年谱》卷上。

的悲哀。

不过到清中叶以后，乾嘉之学已是山穷水尽，清王朝的由盛而衰，使有识之士们不得不作深沉的思考，因为考据之学毕竟是远离实际的象牙塔，一味在古代经典中探幽索微丝毫无助于抒解国忧民困，这就促使一批学者走上经世致用的道路，《皇朝经世文编》、《皇朝经世文续编》之类大型文集的编辑出版，而且筹划者与编纂者又大多是当时的著名高官与著名学者，于是世林学风便为之一变，研究国计民生等现实问题者逐渐增多。

鸦片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渐突显；太平天国起义，更直接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清王朝与依附于清王朝的官僚、士大夫群体，都面临着千古未有的大变局，并且经受着时代潮流的有力冲击。清朝的王公贵族和作为其支柱的八旗绿营已是不堪一击，北京政府不得不转向乘势崛起的汉族地方实力派求助，而这些新兴集团的枢纽人物中就包括不少以经世致用为抱负的知识分子，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这些中兴名臣由于协助清朝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和其他少数民族起义，使风雨飘摇的地主阶级统治重新获得稳定，他们不仅在自己作为封疆大臣的辖区得以施展抱负，而且对清朝枢廷的决策也有相当影响。在这些洋务派权势人物的周围，又大多都聚集着一批学有专长的幕僚，或能运筹策划，或有专业特长，或善经营管理，都不同于过去那种只能坐而论道的儒生。这就使经世学风不仅在理念上而且在实践上都增强了影响，对于长期处于闭塞保守状况的旧式文人形成导向。于是，曾国藩等人所提倡的义理、辞章、考据为一炉的桐城派风格，便从文学走向实务。

张謇由于师从张裕钊多年，与另一桐城派知名文士吴汝纶也有密切交往，所以他便顺理成章地选择了这一路向，从学以致仕转变为学以致用。他在光绪十七年（1891）给朋友的信中品评当代人物，同时也表述了自己的志趣：“走少苦贱，长又苦贫。生平师友，